

花厅墓地的人类学考察

黄建秋

(韩国全南大学人类学系)

This paper sorts the potteries of Huating Site into the following types: Dawenkou style, Liangzhu style, Xuejiagang style, Dawenkou-Liangzhu style, Dawenkou-Xuejiagang style, and the Jade articles are categorized into the following groups: Liangzhu style, Huating style and syncretic style. In the light of the cultural features of the funeral objects, the residence of Huating involves Dawenkou people, Liangzhu people and Xuejiagang people. Dawenkou people adapted themselves to the Jade culture of Liangzhu, while Liangzhu people and Xuejiagang people took in some important funeral rites of Dawenkou. As Liangzhu people moved into Huating, people of Huating, who used to consist of two groups: the riches and the common, broke up into three groups: the nobles, the riches and the commons, and the Huating society was then transformed from a simple society into a complex one. Early people of these three distinct archaeological cultures lived together in Huating, and hence created an archaeological culture of much complexity and diversity.

Key Words: Compromise style Syncretic style Symbol of Social Status The Nobles
The Riches The Commons

内容提要 把花厅墓地随葬的陶器划分为大汶口式、良渚式、薛家岗式和大汶口—良渚式、大汶口—薛家岗式,把玉器划分为良渚式、花厅式和融合式。根据随葬品的文化属性推测该花厅居民有大汶口人、良渚人和薛家岗人,大汶口人接受了良渚人的玉文化,良渚人和薛家岗人接受了大汶口的重要丧葬习俗。随着良渚人进入花厅,花厅由原来的富人和平民两个阶层分裂为贵族、富人和平民三个阶层,并使花厅由简单社会向复杂社会变化。三个不同考古学文化的先民在花厅共生共存,创造了面貌较为复杂和多样的考古学文化。

关键词 折衷型 融合型 身份标志 贵族 富人 平民
中图分类号 K871.13 **文献标识码** A

花厅墓地位于江苏省北部的新沂县,1952~1989年间南京博物院等单位先后四次调查发掘了该墓地,发现它是一处文化面貌比较复杂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墓地。一些考古学者用文化两合现象、联姻、军事征伐等概念解释该墓地呈现的多元文化面貌^[1]。本文拟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分析花厅墓地的多元文化现象,作为透物见人的尝试。

一 墓葬分期和分类

花厅墓地分南北两个区,在南区清理了23座

墓,在北区清理了62座墓,另有2座墓位置不详。下面根据随葬品分析,对这批墓葬进行分期和分类。

根据陶器形态变化,花厅墓地可划分为四个时期(表一)^[2]。又根据随葬品功能和组合的不同,可以把随葬象征具有较高社会地位的玉琮、玉梳背饰、玉项饰等的墓作为大型墓,把随葬象征富有的玉镯、环等的墓葬作为中型墓,把随葬陶石器等的墓葬作为小型墓。花厅的墓葬的分期分类结果

表一// 花厅墓地墓葬分期表

	凿形足鼎	背壶	带把杯	实足鬲	宽扁足盆形鼎	扁足盆形鼎	圆镂空喇叭形圈足豆	高领壶	三角镂空喇叭形圈足豆	溜肩壶	平底带流壶	大缸	期别
M123	I												第一期
M115		I	I、II										
M58				I									
M48				II									
M20		I			I								第二期
M49						I							
M122	II						I						
M12		I											
M16		I						I					
M4		II											
M18		II			II								
M119			III										
M30		II											
M36		III							I、II				
M41		II								I			
M106	III												
M27						II							
M34		I				III		II			I		
M5												I	第三期
M110							II						
M21					III								
M32													
M19		II		III					III				
T208		III											
M61		III											
M55		III											
M118							III						
M108							III						
M37	III									II			
M105	IV												
M50											II	II、III	第四期
M35		III									III		
M56										III			
M23								III					
M53													
M28													
M60		III	III	IV								IV	

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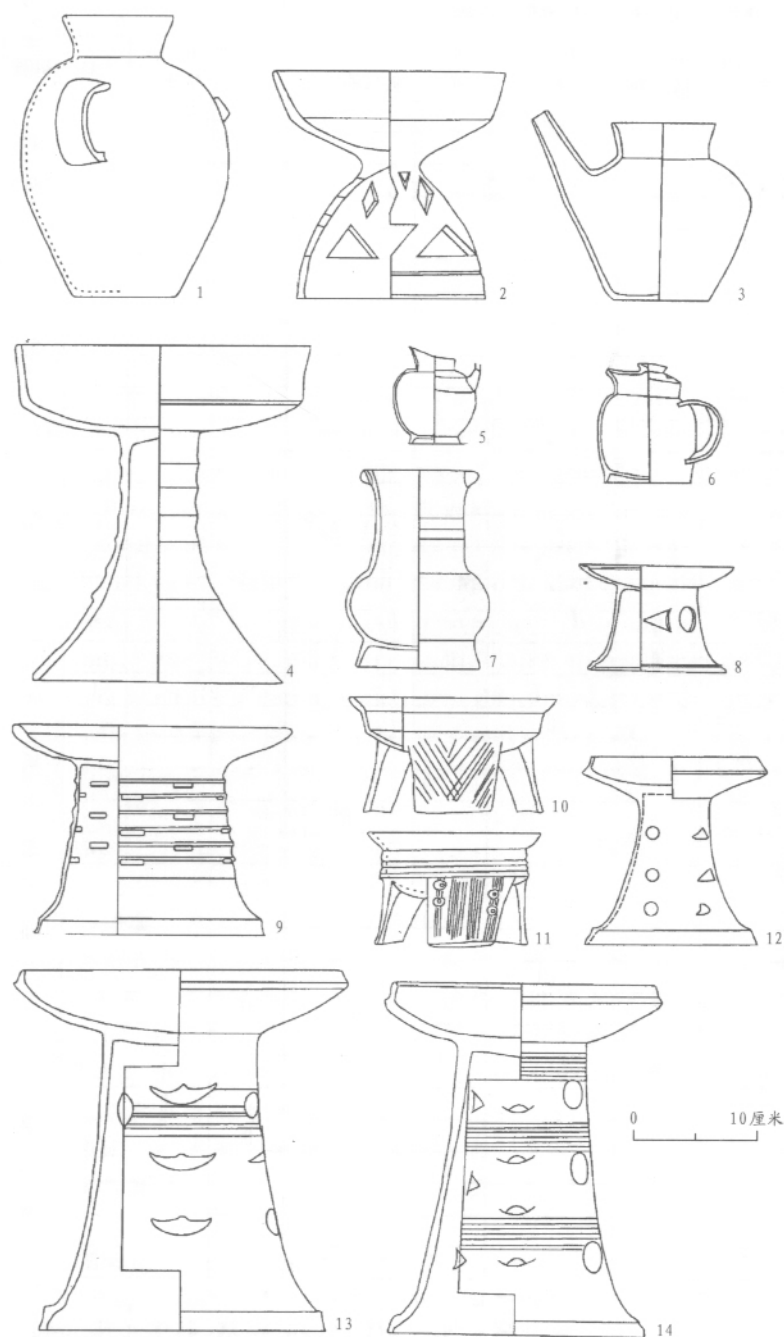
第一期,共有 7 (15)座墓^[3]。其中 3 (6)座中型墓,4 (10)座小型墓。南区有 1 (2)座中型墓,2 (3)座小型墓;北区有 2 (3)座中型墓,2 (6)座小型墓。

第二期,共有 15 (24)座墓。其中 3 座大型墓,9 (15)座中型墓,3 (6)座小型墓。南区有 3 (6)座小型墓;北区有 3 座大型墓,9 (15)座中型墓。3 座大型墓。估计是资料不足导致了南区不见中型墓、北区不见小型墓。

第三期,共有 16 (26)座墓。其中 1 座大型墓,11 (19)座中型墓,4 (6)座小型墓。南区有 1 (2)座中型墓,3 (6)座小型墓;北区有 1 座大型墓,1 (7)座中型墓,1 (3)座小型墓。

第四期,共有 9 (16)座墓。其中 2 座大型墓,3 (6)座中型墓和 4 (6)座小型墓。南区有 2 (4)座小型墓;北区有 2 座大型墓,3 (6)座中型墓,2 (6)座小型墓。

二 文化属性及居民构成



图一// 花厅墓地出土陶器分类

1~3. 大汶口式陶器 4~7. 良渚式陶器 8,9. 大汶口-良渚折衷型陶豆

10,11. 薛家岗式陶器 12~14. 大汶口-薛家岗折衷型陶豆

下面按上述分期,探讨各个时期随葬品的文化属性,并根据随葬品的文化属性推测不同时期花厅的居民构成情况。

1. 随葬品的文化属性

首先,分析花厅墓地的陶器。根据陶器形态特点,可以把它们划分为五组。

第一组陶器,与大汶口文化陶器相同或者相似,可以称为大汶口式陶器,应该是大汶口人的作品(图一:1~3)。

第二组陶器,与良渚文化陶器相同或者相似,可以称为良渚式陶器(图一:4~7)。物理学家曾利用X射线衍射长石定量分析、岩相分析和铅同位素等方法分析了该组陶器碎片,他们认为其中部分陶器产于良渚文化分布中心区域,有少数陶器产地难以确认^[4]。据此可知,这组陶器要么是移民到此的良渚人制作的,要么是来自良渚文化的舶来品。

第三组陶器,与薛家岗文化陶器相同或者相似,可以称为薛家岗式陶器(图一:10、11)。这组陶器数量少,要么是移民到此的薛家岗人制作的,要么是来自薛家岗文化的舶来品。

第四组陶器,兼有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化陶豆特征的豆,可以称为大汶口-良渚折衷型陶豆(图一:8、9)。

第五类陶器,兼有大汶口文化和薛家岗文化陶豆特征的豆,可以称为大汶口-薛家岗折衷型陶豆(图一:12~14)。

折衷型陶器是兼有两个考古学文化陶器特质的新产品,它是两个不同考古学文化的成员长时期接触,其中一方根据自己的需要把对方的文

化特质融入到己方的作品之中的产物。大汶口-良渚折衷型陶豆具有大汶口陶豆把下方的高台和良渚陶豆盘和豆把上部造型,它是良渚人在花厅

吸收大汶口文化特质制作的新型陶豆^[5]。大汶口—薛家岗式陶豆是薛家岗人在花厅吸收了大汶口陶豆把造型及豆把上的纹样制作的新型陶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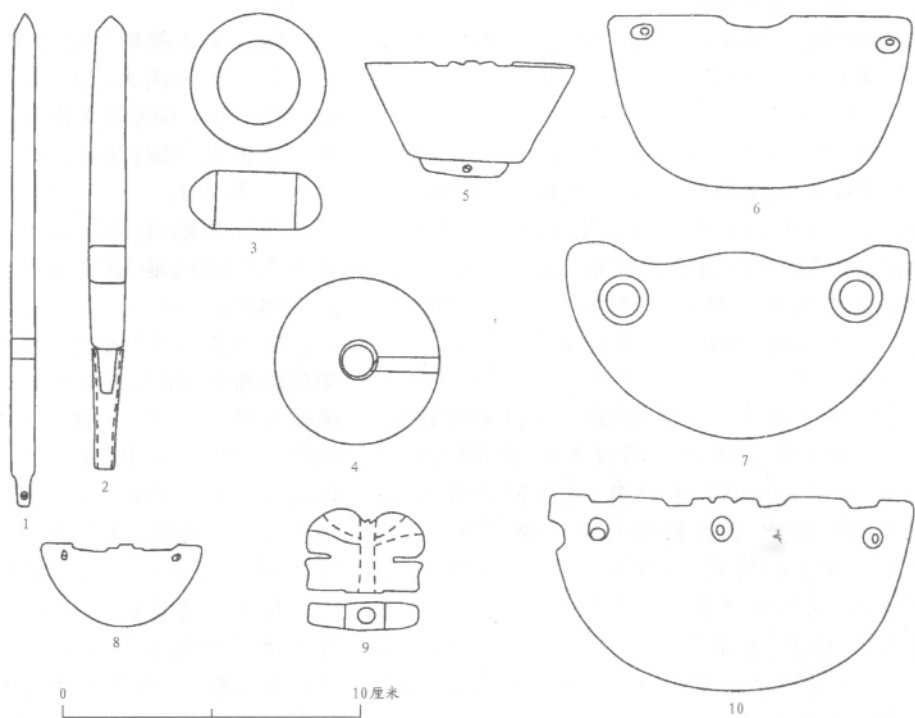
接下来分析玉器。花厅墓地中有些玉器与良渚文化相同,可以称为良渚式玉器,通过形态等比较,发现它们是来自良渚文化的舶来品(图二:1~4)。有些玉器与良渚文化的玉器似是而非,可以称为花厅式玉器(图二:5~7、

9)。还有一些玉器兼有良渚文化两种玉器造型,可以称之为融合型玉器(图二:8、10)。良渚文化不见花厅式玉器和融合型玉器,而花厅墓地北区1座残墓发现2件大型玉核芯,可见花厅式玉器和融合型玉器是在花厅制作的。制玉是一项需要高超技艺、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的手工业,大汶口文化几乎没有制玉工业,所以我们认为,花厅墓地的玉器除舶来品外,其余是来自良渚的工匠在花厅制作的。

2. 花厅居民的构成

根据上面的分析可知,花厅不仅有大汶口人,还有来自良渚文化的良渚人和来自薛家岗文化的薛家岗人。从考古学上辨别花厅墓地的死者属于是哪个文化的居民实非易事,作为尝试,我们拟根据随葬品的文化属性推测墓主的文化属性。

一般认为,随葬品是死者生前地位、身份的标志,其中的身份标志应该包括其文化属性。从视死如生的观点看,在多元文化共同体内有必要考虑给死者随葬能够标示其文化属性的器物,可以把这类陶器称为身份认同标识(简称身份标志)。身份标志应该是能够代表该考古学文化的典型器,



图二// 花厅墓葬出土玉器分类

1~4. 良渚式玉器 5~7、9. 花厅式玉器 8、10. 融合型玉器

比如双鼻壶和折肩壶可以作为良渚人的身份标志,大汶口—良渚式陶豆也可以作为良渚人的身份标识。同样道理,扁宽足鼎和大汶口—薛家岗式陶豆可以作为薛家岗人的身份标识。遇到既随葬大汶口—薛家岗式陶器又随葬良渚式陶器,或者既随葬大汶口—良渚式陶器又随葬薛家岗式陶器时,应该把折衷型陶器做为身份标志。

这样,可以把没有良渚式陶豆、大汶口—良渚式陶豆的墓主当作大汶口人,把随葬良渚式陶器或者大汶口—良渚式陶器的墓主当作良渚人,把随葬薛家岗式陶器的墓主当作薛家岗人。有1座大型墓既随葬大汶口—薛家岗式陶器又随葬大汶口—良渚式陶器,因为它还随葬良渚玉琮,所以墓主应是良渚人。

如果上面的分析尚有可取之处,那么可以认为花厅居民以大汶口人为主,另有少量良渚人和薛家岗人的看法不会有大错。

根据对各类随葬品的社会功能分析,我们可以把随葬玉琮、玉梳背饰、玉项饰的大型墓墓主称为贵族,把随葬装饰性玉器的中型墓墓主称为富人,把只随葬陶器和石器的墓主称为平民。

三 各个时期的社会结构

下面将按上面的墓葬分期和分类探讨花厅墓地所反映的社会结构及其变迁过程。

1. 第一期

南区有 2 座大汶口富人墓, 3 座大汶口平民墓; 北区有 3 座良渚富人墓, 6 座良渚平民墓。由此可见, 花厅内部成员已经分化为富人和平民两个阶层。南区和北区既有富人墓又有平民墓, 说明两个墓区之间没有差距。花厅社会为富人和平民组成的二元结构, 尚处在简单社会阶段。

2. 第二期

北区有 1 座大汶口贵族墓, 2 座良渚贵族墓。2 座良渚富人墓, 1 座薛家岗富人墓, 12 座大汶口富人墓, 3 座大汶口平民墓。南区没有贵族墓, 只有 6 座平民墓。花厅社会开始出现了凌驾于富人和平民之上的贵族。花厅社会由二元结构变成三元结构, 从简单社会变为复杂社会。贵族少, 富人较多, 平民多, 显示花厅社会阶层结构类似纺锤体形。北区墓主中出现贵族, 而南区则没有, 南北墓区开始出现差异。

3. 第三期

北区有 1 座大汶口贵族墓, 5 座是良渚富人墓, 1 座是薛家岗富人墓, 11 座大汶口富人墓。4 座大汶口平民墓。南区有 2 座大汶口富人墓, 5 座大汶口平民墓。社会结构与第二期相同, 依然是贵族和平民少, 富人多, 社会结构仍然呈现纺锤体形。南区墓主中只有平民和富人两个阶层, 而北区墓主中平民、富人和贵族兼备, 可见南北墓区所反映的南北两个集团之间的差异一直存在。

4. 第四期

北区有 2 座良渚贵族墓, 2 座良渚富人墓, 3 座大汶口富人墓, 1 座良渚平民墓, 4 座大汶口平民墓。南区有 4 座平民墓。虽然花厅社会还是三元结构, 但是富人墓数量锐减, 平民墓数量上升, 社会结构已经由此前的纺锤形变为上小下大的金字塔形结构。南区不见富人墓, 北区富人墓减少, 平民墓增加。值得注意还有出现良渚平民墓, 原来一直位居社会中上阶层的良渚人内部严重分化。

以上分析表明, 花厅墓地南区始终没有出现贵族墓, 只有少量富人和很多平民墓。而北区集中了所有的贵族墓、大量富人和少数平民墓。南北两个墓区是否相当于两个大的家族墓地还有待进一步分析。从第二期开始北区墓地所代表的集团势力明显上升并且一直保持到第四期, 究其原因似

乎与良渚人进入花厅有着密切的关系。

四 文化差异与融合

花厅社会由大汶口人、良渚人和薛家岗人组成, 他们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 共同在此上演了一场文化折衷与融合的历史剧。

1. 第一期

花厅墓地有多座良渚人墓, 说明已经有不少良渚人移居此地, 说明花厅居民由大汶口人和良渚人构成。

按大汶口文化的葬俗, 死者头向东。而按良渚文化的葬俗, 死者头向南。死者头向是丧葬仪式中最重要的环节之一, 良渚人与大汶口人对死者头向都有严格的规定。在死者头向对立中, 以良渚人遵从了大汶口文化死者头向东的习俗而化解了这个冲突。应该说, 这是良渚人深明大义为立足花厅、为在花厅长治久安而采取的上策。

良渚人除了随葬良渚式玉器外, 只随葬一两件良渚式陶器作为文化认同标识, 而大量随葬大汶口式陶器, 说明他们竭力消除文化对立, 把他们与大汶口文化之间的差异降低到最低点。

当然, 大汶口人在这个过程中也接受了良渚文化的玉器, 促成了双方文化的融合。

良渚文化与大汶口文化在葬俗方面还存在一些差异, 比如大汶口人中流行随葬猪头、葬狗, 而良渚文化分布区无此习俗。花厅的良渚人在这个阶段还没有采借这个葬俗, 估计是他们认识到葬猪、葬狗并非大汶口人必须遵守的葬俗而是因人而异的做法的缘故。

关于大汶口文化葬猪, 有人认为猪头骨或猪下颌骨是死者生前收藏的财富的象征。细审报告刊布的线图, 发现不少猪头保存完好, 有些猪下颌骨上门齿、犬齿保存完好, 猪蹄骨排列有序, 不似长期保存后被用于随葬的猪骨, 而是宰杀后立即随葬的猪头的遗骸。从民族志看, 随葬猪头或猪下颌可以解读为, 大汶口人流行利用丧葬活动举行猪肉盛宴, 名义上用猪给死者随葬, 实际上只把猪头、猪下颌或猪蹄给死者随葬, 而把大量猪肉用于款待宾客, 以此炫耀丧主是多么富有。宰杀的猪越多, 表明丧主越富有, 从而赢得人们对他的尊敬^[6]。因此, 葬猪本质上是利用消耗财产来获取社会名誉的竞争活动的表象。

2. 第二期

从花厅出现薛家岗式陶器看, 薛家岗人已经进入花厅。花厅居民由大汶口人、良渚人和薛家岗

人构成。

花厅出现的大汶口—良渚式陶豆,是良渚人为了表示他们对大汶口文化的认同不惜在作为身份标识的陶器上加入大汶口文化要素的结果,这是良渚人为了博得大汶口人的认同而淡化良渚文化色彩的又一个重要举措。

这个阶段有1座良渚贵族随葬猪下颌,进一步缩小了良渚人与大汶口人之间的文化差异。初来乍到的薛家岗人也随葬猪下颌和良渚式玉器,说明他们迅速融入到花厅社会之中,之所以出现这个局面,也许是他们与大汶口文化早有联系的有关。

3. 第三期

出现了大汶口—薛家岗式陶豆,它是薛家岗人采借了大汶口文化特质达到消除他们与大汶口文化差异的一个措施。

良渚人与大汶口文化的差异是良渚人仍然不葬狗,不过葬狗也并非大汶口文化流行的重要葬俗,只有少数墓葬狗,因此葬狗与否不是衡量两个文化有无差异的指标。

4. 第四期

这个时期花厅富人墓数量锐减,而大汶口富人墓数量没有随之锐减,相反出现良渚平民墓。这个现象说明良渚人不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群体,其成员逐渐融合到花厅社会当中,良渚文化、薛家岗文化与大汶口文化进入到真正融合的阶段。

五 余论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看到了随着良渚人进入花厅,花厅社会由略有贫富差异扩展到贫富差异加剧,直至出现殉人^[7]。花厅社会结构由二元变为三元是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和薛家岗文化在此碰撞、交融的结果。

当代人类学研究认为,不同文化可以融合,有选择的吸收外来文化,选择外来文化具有两个特点:1. 由表层到深层。一般情况下,首先选择吸收的是物质层面,其次是社会层面(如各种制度文化),最后是观念的层面,如各种价值观念。2. 同质相吸,异质相距。如果两种文化的性质相近或相似,相互选择较为容易。如果性质不同,则相互选择较为困难^[8]。而本文对花厅新石器时代墓地的分析表明,良渚文化、薛家岗文化和大汶口文化虽然属于异质文化,彼此的价值观不同,但是他们在接受或者采借对方的文化特质创造折衷型文化的过程中,没有遵循先接受物质文化然后再接受制

度文化、观念文化的过程,而是在接受物质文化的同时接受了制度文化和观念文化,这个现象值得我们深思。

[1]严文明:《碰撞与征服——花厅墓地埋葬情况的思考》,《史前考古论集》,科学出版社1998年;高广仁:《花厅墓地“文化两合现象”的分析》,《海岱地区先秦考古论集》,科学出版社2000年;南京博物院:《花厅——新石器时代墓地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3年。

[2]黄建秋:《花厅墓地研究》,待刊。

[3]《花厅——新石器时代墓地发掘报告》并未公布全部发掘资料,所发掘的87座墓中只有47座墓可供分期。虽然无法对其余墓葬分期,但是可以根据该报告附录的墓葬出土器物统计表,划分它们的墓葬等级。为了便于分析花厅墓地社会结构,笔者尝试根据现有不同时期不同类型墓葬所占比例,将无法分期的墓葬划分到各个时期,括号前的数据是实际可以分期的墓葬数量,括号内的数据是计算后得到的墓葬数量。详见拙作《花厅墓地研究》待刊。

[4]池锦旗、王昌燧、河西学、櫛原功一、邹厚本、汪遵国、钱锋:《中国新沂市新石器时代古陶器的产地分析研究》,《中国科技大学学报》第25卷第3期;图一上,长石百分含量分布结果具有多解性,岩相观察结果还应该结合相关地点的土壤分析对比;张巽、王昌燧、陈蓉、芦雪峰、李辉亮、陈江峰:《花厅新石器时代古陶器产地铅同位素示踪的初步探讨》,《科学通报》第42卷第6期,1997年。

[5]黄建秋:《对中国考古类型学研究方法的反思》,《东南文化》2001年第9期。

[6]黄建秋:《大汶口文化葬猪的民族学考察》,待刊。

[7]《花厅》报告中使用了“人殉”一词。从墓内死者位置及随葬品等情况看,情况比较复杂,不宜一概定为殉葬。比如M18是一对成年男女和两个幼儿的合葬墓,每个死者身边都有精美的随葬品,女性死者手戴玉镯,从中看不出男女之间存在明显地位差异。大汶口遗址的M35与此类似,该墓为一对成年男女和一个儿童的合葬墓,虽然随葬品多放在人骨架头顶和男性一侧,很难把女性看作为殉葬者。

[8]李长莉:《文化的选择性与文化融合》,《思想战线》(云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报)1999年第6期。

参考文献:

英·A. R. 拉德克利夫—布朗著,夏建中译:《社会人类学方法》,华夏出版社2002年。

黄淑娉、龚佩华:《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